

「明代研究新趨勢」學術座談會報導

江昱緯*

日期：2023年4月15日（六）

地點：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主持人：呂妙芬（中國明代研究學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主講人：巫仁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講題：晚明消費文化在全球史上的地位

主講人：長谷川正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講題：東亞視角下的近年明代研究

主講人：孔令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講題：從中央歐亞視角看明代跨境史研究之新趨勢

中國明代研究學會舉辦「明代研究新趨勢」學術座談會，本次座談會以「全球史」為主題，邀請中研院近史所巫仁恕教授、臺大歷史學系長谷川正人教授與中研院史語所孔令偉教授，分別就消費文化、東亞視角與跨境史三個領域，分享近年來明代研究的新趨勢。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Email: kaulitz0826@gmail.com。

一、晚明消費文化在全球史上的地位

巫仁恕教授長期致力於明清城市史、物質與消費文化研究，著有專書《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與《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閒消費與空間變遷》等數種，本次演講主要討論近二十年來中西消費文化史的新議題，及其對晚明研究的啟發。

消費文化史的研究起源於英國史學界，1982年 Neil McKendrick 提出近代早期（十八世紀前葉）的英國發生了「消費者革命」之說，主張全球第一個形成消費社會的是英國，也為工業革命的到來做好準備。他從國內需求來探討工業革命的起源，其實也與冷戰時期的知識氛圍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此後的發展激發了利用遺產清冊（probate inventory）的史料，以試圖建立消費社會的早期起源。最初，這些努力主要集中在那些假定發生重要消費者變化的地區，例如：18世紀的英國與17世紀荷蘭德弗里斯共和國。自從1980年代的那些開創性的研究以來，消費史的研究在空間、時間和社會三個方面有更加的擴大。

先就跨空間而言，有學者發現「消費革命」的許多方面，例如：新奢侈品在社會廣泛階層中前所未有的傳播，也發生在歐洲以外的地區，例如晚明的中國已形成如前所述之消費社會與消費者革命。又如：有關奧斯曼帝國的歷史，從遺產清冊的研究再次強化了消費者增長這一點也在當地發生。由是不應將近代早期消費史上歐洲的特殊性、例外論，視為理所當然。

其次是關於跨時間方面，關於中世紀晚期貿易和十六世紀家庭財產的研究表明，在被描述為消費革命時期之前，已出現國內奢侈品消費的顯著增長。尤其是研究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學者對上述消費革命之說批評最烈，如 Richard Goldthwaite 就指出：文藝復興時期對物質的沉迷及其對當時社會、商業和生產的影響，已經預示了現代消費社會的基本特徵。這也引發我們思考晚明之前的宋代也出現奢侈風、禁奢令、商品化的情形，如何解釋其與晚明的差異？

第三方面是涉及社會變遷，亦即有能力的消費者是否擴大社會範圍？消費社會的規模是否擴大？Neil McKendrick 最初將消費革命設想為「前所未有地深入社會底層」，但對這一說法的實證支持仍然相當薄弱。即使有遺產清冊的存在，其本身本就偏向於社會中層及以上的群體所擁有。較肯定的是新商品進入了下層階級，但是否代表中下階層的絕對生活水平與社會地位的提高則仍有疑問。明清的消費史也有同樣的問題，例如從明清徽州的分家單與鬮書，雖然可以看到奢侈物品的普及，但明代留存者多為中、小型商人之家，清代徽州的分家單較多，擁有者多為農村之家，但內容簡單，幾乎未述及動產物品，於是很難驗證新商品的普及程度。

近年來有關近代早期的消費史研究也逐漸邁向全球化的解釋，不再是以西方為唯一中心。例如：Frank Trentmann 的巨著就指出近代早期的「三大消費文化」，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晚明的中國（1520-1644）、17 與 18 世紀時的荷蘭與英國。其實東、西方皆形成的消費社會現象，是相互依存的。Maxine Berg 認為印度印花布、中國瓷器和日本漆器在英國社會的傳播，破壞了以前由奢侈立法強加的統一性和明確的社會等級制度。而晚明大量的來自日本與美洲的白銀流入中國，改變貨幣制度，新的交易媒介擴大市場交易的規模，亦即影響人們可以奢侈消費，造成身分等級制度的崩解。此外，也有學者注意到近代早期的全球貿易造形成世界性消費（cosmopolitan consumption）成為物質生活最顯著的特徵，物質世界主義（material cosmopolitanism）已經蔓延到全球許多地區。

再如流行時尚的全球史角度，指出流行時尚不再是歐洲人發明的特殊現象，近代早期的印度、中國與日本皆有類似的現象。在晚明已見服飾的時尚隨時異制，至少出現復古、新奇與崇洋等流行風，甚至影響社會中下階層，而有僭越與模仿的行為。也有關於服飾法規的全球史研究，從中世紀晚期至近代早期，收錄有關明代忠靖冠的研究，揭示了禁奢令作為個人和國家之間爭論場域的重要性。

近代早期中國與歐洲的跨文化物品也成為熱門的研究課題，其核心問題是物品在歐洲和中國之間的流動性，以及由於它們的跨文化生活而展開的轉變。這類研究偏向藝術史、物質文化與消費史。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關於近代

早期中國商品的全球化研究中，段曉琳探討晚明的絲織業與絲織品對西班牙殖民地的影響，特別是墨西哥地區的流行時尚與禁奢令的形成，別有新意。

正如何律格（Craig Clunas）所言，現在看來繼續爭論中國在明代是否也正在發展消費社會似乎沒有什麼意義。既有的證據已經足以使歐洲例外論的主張看起來越來越具有防禦性，並最終有點反常。從研究策略上講，將明代中國寫入全球「近代早期」的歷史具有相當大的意義，如今已廣為人知，但我們應該更進一步去探討兩者的異同。

二、東亞視角下的近年明代研究

長谷川正人教授的研究領域為明清史和中朝邊境史，近來則關注環境史的課題，本次主要從「華、人、物、樹」四個面向，分享東亞視角下的明代研究新著。

2022年，岡本隆司出版《明代とは何か：「危機」の世界史と東アジア》一書。岡本教授是近代亞洲史的專家，近年因開設明史相關課程，並在學術交流的過程中，意識到明史是一重要的領域。岡本隆司提及，在過往日本學者的研究中，明史並沒有被視為主流的研究領域。他認為如此印象的形成，與過去研究聚焦於元末明初與晚明清初兩大時段有關，對於明史仍缺乏一個長時段的研究與整體性的認識。岡本隆司的說法頗有啟發，以下將通過「華、人、物、樹」四個面向介紹數本新著，期能對明史有更多新的認識。

在「華」方面，相關主題有華夏、大中華與小中華等議題，程永超《華夷變態の東アジア：近世日本・朝鮮・中国三国關係史の研究》（2021）一書，討論17至19世紀中、日、朝的三國關係，書中反省過去將東亞關係史視為中朝、中日與日朝研究的累加，忽略三國之間的互動與影響，並指出在明朝與日本在壬辰倭亂中的談判以及日朝官員的通交交涉的過程中，「第三國」的存在扮演關鍵的角色。不過，另有學者指出當時沒有三國官員同場進行交涉的場合，以「三國關係」為稱仍有商榷的餘地。此外，隨著日、韓學術交流頻繁，日、韓學者編輯的《壬辰倭亂斗 東亞細亞世界の變動》（2010）便指出壬辰倭亂對於東亞世界造成極大衝擊。另在東亞研究的框架下，韓國學

界也十分重視後金建國時期的朝鮮國王——光海君，討論其對明朝與後金的政策，相關研究可見韓明基所著《光海君》(2010)。

在「人」方面，圍繞著壬辰倭亂、明清鼎革等重要事件，人群間的往來、交流，甚或漂流人事件皆是重要的議題。孫衛國《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之嬗變，1627-1910》(2019) 主要從朝鮮史的角度，透過數個政治事件、思想觀念與燕行使的個案討論中，考察朝鮮王朝從「尊明貶清」過渡到「尊明奉清」的歷程。另外，加拿大學者 Adam Bohnet 的 *Turning toward Edification: Foreigners in Chosŏn Korea* (2020) 一書，則觸及朝鮮如何處理壬辰倭亂與明清鼎革時逃至朝鮮的明人以及其後代，將有助於重新思考明清鼎革對海外華人的影響。

在「物」方面，2021 年岩井茂樹《朝貢・海禁・互市：近世東アジアの貿易と秩序》問世，該書挑戰長期以來的「朝貢體系」論，而提出「互市秩序」的概念，書中強調將明代的交易制度置於東亞的脈絡考察，並進一步討論明朝海禁政策與亞洲海洋交易網絡之間的互動關係。

在「樹」方面，隨著環境史的發展，學者開始注意相關的問題，如伊懋可《大象的退卻：一部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提及明代的森林砍伐、戰爭與水利工程對於環境的影響，提示讀者明代在環境史上的重要性。另外，藝術史學者 Aurelia Campbell 的 *What the Emperor Built* (2020) 討論永樂皇帝於靖難之變後如何透過皇宮寺廟的營建建立其權威，書中提到營造北京皇宮的木材多來自四川、貴州等西南地區，是一兼具環境史與邊境議題的著作。

總括「華、人、物、樹」各自的問題意識，「華」涉及外交史，「人」則關乎社會思想史，「物」與社會經濟史密切相關，「樹」涉及生態環境史與藝術史，這些研究都能互相連結，因此「華、人、物、樹」並非單一的課題或領域，而是一起提供我們思考「何謂明史」的重要切入點。

三、從中央歐亞視角看明代跨境史研究之新趨勢

孔令偉教授的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世中國與歐亞大陸交流史、科技史、全

球史以及滿蒙藏諸語歷史語文學，本次演講主要從中央歐亞（Central Eurasia）的視角，討論近年來明代跨境史的研究趨勢。

明代具「內亞性」與否，是一備受爭議的問題，這涉及是否能將明代視為一個「帝國」。在過去的史學研究，常以「朝廷史」的角度，將傳統中國政治制度分作內廷與外朝來討論，進而忽略明朝與非藩屬政權的互動情形。若我們從「帝國史」的視角討論明代，得以凸顯其文化的多元性，並可觀察元明清政權性質的延續，及同時期歐亞大陸的帝國競合。就史料與研究方法切入，明代留有多語種文獻的寫本、刻本等，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明代兵部題行檔、滿蒙藏文史籍檔冊與石刻史料。若進一步與漢文史料比較，並藉由跨學科、語文學與數位人文的方法，將有助於明代跨境史的研究。以下即就明蒙滿關係、藏漢佛教、物質文化與地圖知識四個面向進行說明。

首先，在明、蒙、滿關係方面，過去論及元明、清的斷裂與延續時，或強調明朝的漢人政權正統性，或側重元、清二朝的族群特色，多認為明與元、清有較大的斷裂。不過，在卜正民（Timothy Brook）與魯大維（David Robinson）的研究中，指出明代在政治與文化上皆繼承蒙元的遺產，開始強調明代的內亞性，如卜正民認為明朝國號「大明」，即受蒙元政治的「大國」（*yeke ulus*）傳統影響。因此，未來的明代蒙滿史研究應跳脫「北元」、「後金」的中原敘事，從域外的角度重新思考「朝貢」、「長城」等議題。如以明、蒙、滿之間的移民活動為例，跨界人群的移動並未隨著長城建立而中斷，中原本土的蒙元移民及蒙古地區的漢藏移民，他們交換農耕、建築技術及軍事外交情報，並在語言文化上留下互動的線索。

在漢藏佛教與文化交流方面，亦得展現明代內亞性的延續。例如：沈衛榮指出西夏、蒙元、明、清間的宮廷中，薩迦派密法的傳承並未中斷；安海燕考察在北京城內由皇家供養的漢藏僧團，及其翻譯藏傳佛典的工作。另外，隨著藏漢佛教的密切交流，留下不少多語種文書，有待明史研究者注意，例如：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吉祥喜金剛集輪甘露泉》，以及明代中官群體傳鈔的《金剛經》注等。

至於物質與視覺文化方面，元代以前，繪畫中的獒犬形象多與山海經描

繪的樣貌相近。元代以後，隨著與西藏的互動增加，圖繪中的獒犬形象即與藏獒相近，並成為當時熱門的繪畫題材。此外，「大象」也是一個展現元明清延續性的議題。現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出警入蹕圖》，據學者考證為神宗萬曆十一年（1583）春祭謁陵圖像。值得注意的是，圖中繪有大象，並在象身置有寶瓶，實是蒙元騎象風尚的遺留。從佛教文化來看，大約在十六世紀後期的蒙古文《白史》中，將轉輪王的認定與淨瓶白象連結；而大象成為皇權的象徵，並延續至清代，其中明代的鏈接性角色不可忽略。

最後，在地圖與知識方面，〈大明混一圖〉（1389）與〈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繪製的世界地圖，有學者考證兩幅地圖的知識來源，認為其反映元人的地理知識，可見元明的延續性。就以上四個面向而論，或許我們能超越「斷代史」下的元、明、清史研究，嘗試從東亞、歐亞乃至世界史的視野，號召不同領域的學者，在既有與新開拓的議題上增加互動的機會。